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王德华, 宋雪玲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杭州 310012)

摘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关键词: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西南夷;政治背景;讽谏主旨;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092-07

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同被萧统收入《文选》“檄”类。“檄”类只五篇文章,可见相如之文在萧统心中的地位。两文对我们了解司马相如一生最为辉煌的事功——“通西南夷”,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喻巴蜀檄》主旨明确,争论较少;而关于《难蜀父老》的主旨,却有分歧,且关涉对相如人品、通西南夷意义的评价。本文拟在考订《难蜀父老》创作时间的基础上,揭示其创作时的政治与心理背景、讽谏主旨及文化意义。

一 关于《难蜀父老》主旨异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此篇的创作背景云: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1]卷一百一十七,3046}

《汉书》本传同,《文选》李善注采《汉书》之说。

虽然汉唐间现存史料并未明言讽谏的具体内容,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相如撰此文的目的:一是对天子而言是讽谏,二是对蜀父老而言是宣晓天子之意。问题在于,既然是宣晓天子之意,又为何是讽谏天子?且上文又夹杂着相如提议开发并奉命出使西夷时遭到蜀中长老及朝中大臣的反对的政治背景,以及“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这种创作时复杂心理状态,这些都影响后世对《难蜀父老》创作主旨的不同理解。从宋代开始,研究者注意到了《难蜀父老》的主旨内容的探讨。从宋至今,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相如逢君之恶,助成汉武帝好大喜功之习,此文乃劝百讽一之作。如苏轼云:“司马长卿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

收稿日期:2012-04-25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批准编号:NCET-08-0495)。

作者简介:王德华(1965—),女,安徽滁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宋雪玲(1984—),女,安徽宿州人,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门之义乎？”又言：“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2]卷六十五，2010 苏轼以小人目相如，认为《难蜀父老》是一篇迎合主上、劝百讽一的谀文。宋代楼昉曰：“武帝事西南夷，岂是好事？其实相如只是强分疏，却又要强说道理，至以禹治水为比，可谓牵合矣。使人主观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习，非所以正救其失也。”^[3]卷三，27 言相如文中对武帝开边意义论述，助成了武帝好大喜功之习。又明代刘祜亦有此言：“羈縻勿绝，制驭夷狄之大道。相如不杜之于始，而欲挽之于终，吾知好大喜功之主不可药救也已。”^[4]卷十八，246 刘祜批评相如始则未能杜绝武帝开边之想，而“欲挽之于终”，即本传所言“著书以讽”。清何焯对相如“今臣复通（西夷），为置县，愈于南夷”的言论，评曰：“前檄为天子文过，宣谕之体，不得不然也。何复为此以长君恶耶？”对文中“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句，何焯复评曰：“扬子谓劝百讽一，果然。即其所谓终于佚乐者，方且导以封禅之侈心。万乘豫进，民则困于供赋，又有饰在平之容，增逃亡自贼杀之实者。”^[5]293—294 孟子云：“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6]6004 楼昉、刘祜、何焯之言，较之苏轼，虽措辞没有那么激烈，属于孟子所言的“长君之恶”，有着“罪大”与“罪小”之别，但认为《难蜀父老》劝百讽一则是一致的。

其二，相如感蜀父老之言，自悔提议开边之失，意指讽谏天子开边。宋张耒《司马相如论》云：“其后为帝开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说，颇自悔其失，作书为喻蜀，而实以风。夫既以开其利于前也，徐觉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与夫遂非而忍愧者亦异矣。”与苏轼不同的是，张耒认为相如并非小人，其作《难蜀父老》乃因“自悔其失”，目的在于讽谏天子“通西南夷”的劳民伤财之举，并云“司马相如虽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风”，又云“始相如亦自以慕蔣相如，彼其从来，有足观者矣”^[7]卷三八，325。吕祖谦曰：“然闻蜀長老言通西南夷不为用，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风天子。常称病闲居，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则与严助、主父偃辈没于权利者，亦有间也。”^[8]卷一二，461 在讽谏内容的理解上与张耒的理解基本相同，并把相如与严助、主父偃作了比较，说明相如非追权逐利之辈。今人熊伟业提出“两难主题”说，认为《难蜀父

老》的主题有“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的一面，也有“欲谏，以风天子”的一面。与史传无异，只是熊文认为“讽谏巴蜀疲困”^[9]，也与张耒“颇自悔其失”、“徐觉其害”等观点有相通之处。

其三，相如著文，自饰其过。明倪元璐曰：“相如明知通西南夷不为用，乃始其事，又作《难蜀父老》辞，以文其非。”^[10]卷六，604 认为相如明知开发西南夷之弊，但因赞成开边，作文自饰其过。

其四，批评蜀郡反对派，晓喻百姓天子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如龚克昌说：“在司马相如出使时，蜀郡长老不但说通南夷不上算，通西夷也是得不偿失，朝廷大臣也多持这看法，一时弄得满城风雨。为此，相如就写了一篇《难蜀父老文》，批评了蜀郡的反对派，讲明了自己的使命，让百姓知道汉武帝的意图。”^[11]382 也就是说，相如此文是针对蜀郡反对派，驳难的目的是“让百姓知道汉武帝的意图”，并不存在讽谏天子的意图。

其五，托言驳难，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信心。如李孝中、侯柯芳认为：“本文驳论，托言难蜀父老，实际上驳朝廷重臣的错误认识，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信心。”^[12]49 驳朝廷重臣的错误认识，与龚克昌说同；不同的是李、侯认为驳朝廷重臣错误认识的目的是坚定武帝开发西夷的信心，有无讽谏目的，没有明说。

考察历来关于《难蜀父老》主旨异说，可见自宋至今，各说或就史传提供的背景材料探讨其讽谏主旨，或就文本本身摒弃讽谏而另立新说。且从宋至清，在评论此文的主旨上还夹杂着对相如人品的褒贬。可以说，相如出于何种目的、何时何地写下《难蜀父老》，到目前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 《难蜀父老》的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

我们认为，欲弄清《难蜀父老》的主旨，须对汉武帝继位之初开发西南夷的经过、朝廷官员及百姓对汉武帝开边的不同态度、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的时间有一个细致的分析，这是探讨《难蜀父老》主旨的重要前提。

汉武帝继位不几年便开始外定四夷，内兴文教。在对待四夷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争论，形成主战与反战的两大阵营。这一点，班固《汉书·匈奴传赞》就给予了总结，言“《书》戒‘蛮夷

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噲、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13]卷九十四下,3830}班固此言虽是针对西汉与匈奴的关系而发,用之于西汉与西南夷、两越的关系上也大致不差。就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开发西南夷而论,唐蒙、司马相如属于主张开发的一派,公孙弘则是不主张开发的代表。而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对开发西南夷尤其是西夷有着明显的决策转变。

“西南夷”,以汉时蜀郡为参照,其南为南夷,其西为西夷,其所在地域相当于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地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早在秦朝就开始通西南夷并设官吏管辖了。秦亡后,汉初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将精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方边境的安宁,无暇顾及西南夷。《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言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上书通夜郎。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13]卷六,16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徼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1]卷一百一十七,3044}相如《喻巴蜀檄》中云“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1]卷一百一十七,3044},所言正是唐蒙擅自“用军兴法”之事。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元光五年第一次出使西南夷,是奉汉武帝之命责备唐蒙等治南夷道过程中不当之举并安抚巴蜀民众的。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是继唐蒙开发南夷道之后,奉命开发西夷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第一次出使西南夷,“还报”天子后,言: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

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1]卷一百一十七,3046-3047}

以上这则材料,《汉书·司马相如传》也有载,结合《难蜀父老》本文、《史记·公孙弘传》、《汉书·武帝纪》、《史记》《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等史料,我们认为在考定《难蜀父老》创作时间与政治背景时,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上文“治道二岁,道不成”是指元光五年唐蒙开南夷道,二年未成,即时已至元朔元年(前128年)。在这两年当中,元光五年,武帝不仅派了相如出使西南夷,而且派了公孙弘前往视察。《史记·公孙弘传》载:“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淄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1]卷一百一十二,2949}这也正是上文中所说的“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其用事者即指公孙弘为代表的反对派。

其二,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是在元朔元年,其任务是开发西夷。从上文可知,也是在元朔元年,西夷因经济利益,表现出欲归附汉朝的意向。汉武帝咨询司马相如时,司马相如赞同开发西夷,并得到汉武帝的授权前往西夷。《难蜀父老》开篇言“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所谓“汉兴七十有八载”,以高祖公元前206年立汉往后推七十八年,正是汉武帝元朔元年,即相如奉命“西征”、开发西夷之年。

其三,《难蜀父老》的创作时间不是元朔元年,而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创作地点乃是略定西夷之后返程到达蜀都之时。一是因为文中云“因朝冉从駹,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说明此文作于相如略定西夷,东向将报,至于蜀都之时,必不是出使之年即元朔元年。二是文中蜀父老还言“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1]卷一百一十七,3049},从“今又接之以西夷”的语气看,“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是指元光五年唐蒙开南夷道事,那么从元光五年后

推三年,正是元朔二年。

基于以上三点,那么,相如为什么在奉命出使西夷,并“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即出使西夷取得成功,回报至蜀都时作《难蜀父老》呢?又为何在晓喻天子之意的同时讽谏天子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主要担心汉武帝在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中大臣的反对下,改变开发西南夷的决策,前功尽弃。上文已言,朝廷中反对派的代表公孙弘元光五年就提出反对开发西南夷,这次汉武帝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史记·公孙弘传》又载:“元朔三年,张敖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1]卷一百一十二,2950}《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1]卷一百一十六,2995}时隔五年,公孙弘又提出罢西南夷,汉武帝同意了他的提议,独罢西夷,见出汉武帝因专力事匈奴的关系,不得已,在西夷开发上做出了罢西夷的决策转变。史书明确记载公孙弘谏罢西南夷有两次,可以看出,从元光五年至元朔三年这五年间,“弘数言西南夷害”,公孙弘始终未放弃他的罢西南夷的主张。而元朔二年正是元朔元年司马相如奉命开西夷到元朔三年汉武帝罢西夷的转变的关键一年。相如欲谏不敢,并非如张耒所说的出于自己赞成开发西南,又因身感百姓的负担有所反悔,想借此劝谏武帝停止开发西南夷,相反是出于对汉武帝改变决策、放弃开发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相如撰写《难蜀父老》的次年,即元朔三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而罢西夷得以验证。

此外,相如还担心武帝决策改变对自己政治命运的影响。对于开发西南给百姓带来的负担及大臣们的反对,相如第一次出使西南督责唐蒙时就已经知道,而第二次奉命开发西夷,“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也应是在相如预料之中的。他之所以坚定开发西夷,一方面说明他与公孙弘等反对派思考角度不同,另一方面也有汉武帝

的支持。如果汉武帝改变决策,相如政治命运会受到很大影响。这种担忧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唐蒙开南夷道也是武帝同意的,其所引起的巴蜀民怨,武帝内心岂有不知?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还是派相如前往督责。相如《喻巴蜀檄》,虽是奉命晓喻巴蜀,但也有归过唐蒙之意。明凌稚隆、李光缙《史记评林》引董份云:“唐蒙,武帝实任之,奚责焉?盖蒙骚动蜀民,不责蒙无以谢蜀。”^{[14]卷一一七,30}唐蒙前,发生在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失败,建议此举的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13]卷六,162}。据《汉书·韩安国传》,马邑之谋前,在对匈奴采取和亲还是征伐问题上,王恢与韩安国有两次交锋。王恢主战,安国主和。第一次争论,汉武帝采纳了韩安国的和亲主张;第二次交锋,武帝采纳了王恢伏击匈奴的马邑之谋。而马邑之谋失败后,对这次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且带来“自是后,匈奴绝和亲”^{[13]卷九十四上,3765}的政治后果,汉武帝不容王恢辩解,以“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13]卷五十二,2405}为由,逼得王恢自杀。其实,马邑之谋是王恢,真正发动对匈奴战争的首谋应是汉武帝。武帝杀王恢以谢天下,完全是文过饰非,体现了封建帝王的专制与独断。汉武帝此后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的残忍,在王恢身上已露出端倪。可以说,唐蒙与王恢都是前车之鉴。如果在开发西夷问题上,汉武帝有所反悔,相如的命运轻则如唐蒙受到责备,重则如王恢一样被逼自杀,亦未可知。这是相如欲谏不敢、著书以讽的又一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结合《史记·公孙弘传》中的关于公孙弘生平记载,可以了解相如欲谏“不敢”,还担心一旦失去汉武帝的支持,会遭到反对派公孙弘的排挤与打击。如上所述,正如王恢与韩安国在匈奴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司马相如与公孙弘在开发西南夷态度上是针锋相对的。《史记·公孙弘传》载,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1]卷一百一十二,2950}。可见他是一个矫饰善变之人,外表宽和,内心阴险,却深得武帝喜爱。《史记》中与公孙弘同传的主父偃,就是因为公孙弘的阴谋报复于元朔三年被杀的;也是在元朔三年前,董仲舒因公孙弘的猜忌徙为胶西相^①。所以,司马相如在当时想要劝谏武帝坚持开发西南夷,对公孙弘不得不有所顾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难蜀父老》文

后,又言“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1]卷一百一十七,3053}。相如受贿失官,不管真实与否,但发生在出使后不久,其内中实情或与公孙弘有关。

综上,相如在略定西夷之后于蜀都写下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政治背景,也与这一政治背景下,司马相如担心汉武帝在开发西南夷决策上有所改变以及对反对者公孙弘的畏忌有关。这应是相如不敢直谏,“著书”以讽谏天子坚持开发西南夷的重要原因。

三 从文本看《难蜀父老》讽谏主旨及文化意义

从文本本身来看,《难蜀父老》^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开头叙述事件的缘由,结尾一段交代事件的结果,中间主体部分则是驳斥蜀父老眼光的狭隘,阐述“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

文章开篇,作者概述汉王朝国力强盛,四海宾服、恩泽境外的大好形势,以及目前天子命使出征西夷,所向披靡的盛况。然后借“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口,诘难“通西南夷”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其诘难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从文化政策上讲,自古以来天子对夷狄都是采取怀柔羁縻政策,况且西夷自古以来与“中国”并立,既不可德化,也难以征伐;二是从现实利益上看,“通西南夷”不切合实际,前者唐蒙开南夷道业已耗时三年,功业不竟,士卒困顿,万民不安,若再通西夷,民力已尽,难成此业,只会劳民伤财,于国无益。

针对“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的诘难,相如首先以巴蜀变服化俗为例,言“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意谓若只是一味采取羁縻政策,如今的巴蜀也不能变服化俗。正是巴蜀的变化,今日才能推进到对西南夷的开发。接着主要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通西南夷的意义。其一,从国家最高决策者角度,阐明一些非常之事,在实行之初,非百姓所能理解与支持,但最后总是百姓得益,即文章中所言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盖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这是此篇所论基点。并以史实说明,如大禹治水,其治水的过程中,不只是百姓辛劳,大禹也身亲其劳,然其功业泽被万代。其二,阐明贤君君临天下,本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不拘文牵俗,墨守成规,取悦当

世,而是欲创立大业,垂范万世。企求德配天地而思贯天人;耻于恩泽不及天下生灵。当今封境之内,皆享福祉;而夷狄之国,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民俗浇薄,伦理失序,“举踵思慕”君主之仁德恩泽。故当今圣上北讨匈奴,发使南越,因此四方颂其仁德,南北仰其恩泽。最后直接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即开道扩疆,可以仁德远播,光照边夷,使远近一体,同享福祉,天下长治久安。此乃拯救西夷百姓于水火,继承周代一统之绝业,走向盛世的标志,故为当今圣上的当务之急,百姓虽劳,亦不可止。最后说明帝王之业,必始于忧劳,终于安乐。大汉受命,方将封禅泰山,上同五帝,下超三王,这种旷古未有的大事,更不是浅见短识之人所能理解的。

从以上所叙内容可知,相如针对蜀父老诘难依据的羁縻文化政策,强调圣上征讨开发四夷,是羁縻政策失效下,即文中所言“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则邪行横作”,化服变俗,泽被蛮夷,功在千秋的壮举。而针对蜀父老开边病民的观点,相如认为自来帝王都是“始于忧勤,终于佚乐”,说明了劳民与化民的统一。总之,羁縻与征伐,劳民与化民,相如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角度,解决了主开发与反开发的对立。也使诸大夫慨叹:“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相如的驳论,使蜀父老理解了汉天子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并决定不辞劳苦,以身作则,垂范百姓。

由上分析我们也可知,此篇与《喻巴蜀檄》有相通之处:一是武帝开发四夷,其目的是化洽天下,对汉武帝的开边之举都作了颂扬;二是开发西南夷,百姓虽劳,但功在千秋,蜀老将士,应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故萧统将两篇皆入“檄”类,刘勰《文心雕龙·移檄》赞《难蜀父老》“有移檄之骨”,二者皆有晓喻圣意的缘故^{[15]379}。可以说,坚持开发西南是司马相如的一贯主张,不存在“自悔其失”,良心发现似地劝谏汉武帝考虑劳民而停止开边。结合以上《难蜀父老》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的考察,此篇的讽谏主旨就是希望汉武帝打消开发西南夷的疑虑,借晓喻天子之意,坚定武帝开边的主张。这一讽谏主旨因《难蜀父老》背后的政治背景的模糊,加上此文“以颂为讽”的谏谏模式而变得隐晦,也导致后人理解上的偏差。

汉武帝对四方边疆的开发,就今天看来,促进了民族融合,功莫大焉。但是也正是在汉武帝开边的

同时,质疑声不断,后世也多责汉武帝好大喜功。从意识形态领域看,蜀父老所言“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的羁縻文化政策,是反战、反开发者所拥持的处理“中国”与四夷关系的文化依据。班固《汉书·匈奴传赞》将这一观点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匈奴传赞》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3]卷九十四下,3833—3834 这种“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的“羁縻不绝”的文化政策,上承于《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夷观,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班固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称“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13]卷九十五,3868,正是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羁縻文化政策,批评司马相如等赞成开边之人为“好事之臣”。以上所述苏轼、楼昉、刘祐、何焯对《难蜀父老》主旨的推断,表面上看,是对《难蜀父老》创作时

间及政治背景的失察、缺少对作品本身的细读与研究乃至对相如人品的非议所造成的,更深层的应是他们本着儒家以德怀远、休战安民的羁縻文化意识而产生的先入之见。

《文选》诏类选了两份诏书,皆汉武帝之作,其中一份是元封五年(前106年)的《求贤诏》。此诏作于司马相如创作《难蜀父老》后的二十二年,相如谢世业已十年。此诏开篇即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将“非常之功”与“非常之人”联系起来,与司马相如文中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的措辞是何等的相近。上引《司马相如传》中言“相如还报,天子大悦”,天子之所以大悦,一方面可能由于相如略定西夷没有像唐蒙那样劳民伤财;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相如把写于蜀都的这篇《难蜀父老》也呈交给了汉武帝的缘故。虽然在元朔三年汉武帝迫于财力与精力,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而罢苍海和西夷,专力匈奴,但他始终未忘记对西南夷的关注。元狩元年(前122年),在张骞的提议下,汉武帝又开始开发西南,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前后约十三年的时间逐渐平定西南夷。可以这么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的以“羁縻”文化政策处理“中国”与四边关系的汉代,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对征伐开边的论述,无疑给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政治军事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相如当初因各种原因不敢直谏,著书以风的《难蜀父老》,在汉武帝时代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注释:

- ①关于主父偃被杀、董仲舒徙胶西相的年代,参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156-157页。
②本节所引《难蜀父老》文,皆出《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3049页。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楼昉.崇古文诀[G]//文渊阁四库全书:13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刘祐.文章正论[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5]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孟子[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张耒.柯山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111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吕祖谦.大事记解题[G]//文渊阁四库全书:3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熊伟业.《难蜀父老》的双重主题[J].文艺评论,2011,(8).

- [10]倪元璐. 秦汉文允[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365 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龚克昌. 中国辞赋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12]李孝中,侯柯芳. 司马相如作品注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13]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明凌稚隆. 史记评林[M]. 万历吴氏凌兴自刊本.
[15]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The New Theory On the Sima Xiangru's *Nan Shu Fu Lao*

WANG De-hua, SONG Xue-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Neither the background nor the satire purport of *Nan Shu Fu Lao* in 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is certain.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have been expressed from different points since Song Dynasty. The book includes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Xi'nan Yi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concern about Emperor Wu of Han's decision. Its' satire purport is to firm the Emperor's determination of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Xi'nan Yi. Sima Xiangru's discusses on this subject provided the Emperor with cultural suppor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Ji Mi" cultural policies with border areas.

Key words: Sima Xiangru; *Nan Shu Fu Lao*; Xi'nan Yi; political background; satire purport; 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唐 普]